

楊熙楠、雷保德編。《翻譯與吸納——大公神學和漢語神學》。香港：道風書社，2004年。331頁。

Yeung, Daniel H. N. and Rabbe, Paul ed. *Translation and Adoption: Ecumenical Theology and Christian Theology in Chinese*. Hong Kong: Institute of Sino-Christian Studies, 2004. 331pp.

本書分四部分：第一部分是「大公神學和漢語神學」，共有五篇文章，分別是奈內的〈作為嘗試理解的教會合一〉、區宗德的〈從歐洲人眼光看相關的神學爭論〉、何光滙的〈關於基督教神學哲學在中國的翻譯和吸納問題〉、賴品超的〈過去與未來的漢語神學——從中西神學著述的翻譯與採納著眼〉、王曉朝的〈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融會的若干問題〉；第二部分是「翻譯——理解與技藝」，共有九篇文章，分別是桑德麥的〈惟有合作才能翻譯〉、尤思德的〈基督教與在中國的翻譯——初探〉、郎宓樹的〈翻譯作為一種習慣過程〉、張慶熊的〈翻譯與生活世界〉、張憲的〈從交互文化理解看翻譯〉、魏育青的〈以《羅馬書釋義》漢譯看交際樣式、語言特點和翻譯問題〉、楊慧林的〈《聖經》詮釋中的意義問題〉、朱雁冰的〈翻譯——一個方法學上和理念上的探索過程〉、李秋零的〈聖三一神漢譯名辨析〉；第三部分是「漢語神學的出版——過去與現在」，共有八篇文章，分別是張賢勇的〈道聲靈風聞神州〉、周偉馳的〈基督教研究中心的「四書兩刊多會」〉、蔡錦圖的〈香港新教神學書籍的翻譯和出版概況〉、林鴻信的〈台灣基督教翻譯與出版情況〉、葉文基的〈俄國東正教會的中譯與研究事工〉、趙建敏的〈上智編譯館簡介〉、張若翰的〈信德書報與德文翻譯出版〉、韓大輝的〈中譯《天主教教理》與文化適應〉；第四部分是「附錄」，共有三篇文章，分別是高夏芳的〈一個中國基督徒的聖經解讀〉、楊劍龍的〈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關係的深入探討——「翻譯與吸納：基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相遇」國際研討會紀要〉、翁嘉琳的〈「翻譯與吸納：基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相遇」會議報導〉。

第一部分「大公神學和漢語神學」，奈內在〈作為嘗試理解的教會合一〉一文中，提出合一運動是「相對主義」和「基要主義」之間的第三條路。特洛爾奇(Ernst Troeltsch)認為自啟蒙運動後，歷史思維將宗教多元性表露無遺，扭轉將基督宗教視為所有宗教歷史的普遍內在發展方向，形成宗教上的「相對主義」。「基要主義」則堅持基督宗教具有不受歷史及相對性影響的出發點。奈內認為，詮釋學可幫助不同教派找尋新的共同點，例如羅馬天主教與世界信義宗聯合會於1999年簽署的《成義教理聯合聲明》，便務實地尋求有差異性的共識。區宗德在〈從歐洲人眼光看相關的神學爭論〉一文中，以中國

「禮儀之爭」為例，說明耶穌會傳教士主要與士大夫接觸，故此他們較肯定中國文化優美之處；方濟各會及多明我會傳教士則多與農夫漁民接觸，導致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落後迷信一面印象深刻，加上多明我會傳教士帶著伊斯蘭世界爭鬥歷史的眼光，思考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課題，以致他們對中國文化存著敵視的態度。雖然耶穌會傳教士尊重中國文化，但利馬竇卻被當時的經院哲學局限其視野，忽略了佛教的「無」和「空」等觀念，本來與否定神學可以有對話的空間。在今天看來，否定神學及實踐倫理的進路，在中國神學本色化的詮釋中，無疑顯得十分重要。至於近年的中國新教神學，則著重對當今中國處境下中國人訴求的回應。何光滬在〈關於基督教神學哲學在中國的翻譯和吸納問題〉一文中，提出十項建議：他先從阿奎那入手，然後才論及奧古斯丁；先介紹蒂利希，然後介紹巴特；先有理性論證，後有信仰體驗；先由上帝論出發，後有基督論；先有人論，然後有神論；先有生存論，後有本體論；先有相容論，後有相斥論；先有愛與善功，後有信與聖經；先有講道，後有禮儀；先有哲學，後有神學。賴品超在〈過去與未來的漢語神學——從中西神學著述的翻譯與採納著眼〉一文中，指出二十及三十年代，與八十及九十年代，漢語神學界除了翻譯西方神學著作以回應當時中國的處境外，亦有原創作品。他估計漢語神學的未來，應會朝向與西方神學作雙向對等的交流。王曉朝在〈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融會的若干問題〉一文中，提出中西文化交流要在平等下進行。他相信，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，不同文化可以共存共榮及互相輝映。雖然，現實裡不可能有絕對意義的準確翻譯及文化融合，但是我們不能放棄這方面的努力。

第二部分「翻譯——理解與技藝」，桑德麥在〈惟有合作才能翻譯〉一文中，提出翻譯意味著改變及吸納。因為在翻譯過程中，外來語言引申文化交流的「共生」(konvivenz)現象：首先，翻譯在一定距離底下進行理解，然後換轉視角、設身處地去理解，及後再在距離下產生「共生」。尤思德在〈基督教與在中國的翻譯——初探〉一文中指出，基督新教與天主教在「耶穌」和「道」的翻譯上甚少爭議，但在「上帝」或「神」、「天主」的課題、「洗禮」的課題上卻意見分歧。郎宓樹在〈翻譯作為一種習慣過程〉一文中，指出翻譯是一種不斷重複的「句型練習」，同時讓新概念完備地成為承載意義的外殼。張慶熊在〈翻譯與生活世界〉一文中，提出翻譯要同時考慮作者及讀者的生活世界。生活世界分為日常生活世界、科學技術生活世界，以及宗教哲學生活世界。宗教哲學生活世界，是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，並且與日常生活及科學技術生活世界有關聯性；而宗教世界的神祕經驗亦可用哲學來論證。張憲在〈從交互文化理解看翻譯〉一文中，提出交互文化理解本質上是人類對自身的自我

理解。理解可以透過不同文化之間的某種共同東西，或相異的東西入手，使理解不必只變成一種自己文化的回聲。魏育青在〈以《羅馬書釋義》漢譯看交際樣式、語言特點和翻譯問題〉一文中，提出翻譯是跨文化的交際過程，翻譯工作要考慮跨文化交際接受者的反應。楊慧林在〈《聖經》詮釋中的意義問題〉一文中，提出翻譯包括解釋，所以在翻譯過程中必須持守信仰的「異質性」，並提醒讀者由「人言」進入「聖言」，深入文本而超越文本，領會「聖言」的無限。朱雁冰在〈翻譯——一個方法學上和理念上的探索過程〉一文中，提出翻譯工作需要從基督教及異文化的「歷史資源」中，尋找相稱和相對應的概念。李秋零在〈聖三一神漢譯名辨析〉一文中，提出用「道」翻譯 *Logos* 優於「言」；用「聖靈」「上帝的靈」翻譯 *Pneuma* 優於「聖神」。

第三部分「漢語神學的出版——過去與現在」，張賢勇在〈道聲靈風聞神州〉一文中，介紹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出版工作。周偉馳在〈基督教研究中心的「四書兩刊多會」〉一文中，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出版工作。蔡錦圖在〈香港新教神學書籍的翻譯和出版概況〉一文中，介紹香港基督新教神學書籍的翻譯和出版概況。林鴻信在〈台灣基督教翻譯與出版情況〉一文中，介紹台灣基督教翻譯與出版情況。葉文基在〈俄國東正教會的中譯與研究事工〉一文中，介紹俄國東正教會中譯文獻整理及研究計劃。趙建敏在〈上智編譯館簡介〉一文中，介紹國內天主教上智編譯館的發展理念。張若翰在〈信德書報與德文翻譯出版〉一文中，介紹中國天主教加強德語神學研究及翻譯出版的願望。韓大輝在〈中譯《天主教教理》與文化適應〉一文中，介紹中國天主教翻譯《天主教教理》的經驗。

第四部分「附錄」，高夏芳在〈一個中國基督徒的聖經解讀〉一文中，提出中國方塊字整體地將圖像與實物或概念相連，同時中國人傾向藝術化解讀文本、重意境及韻味。楊劍龍在〈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關係的深入探討——「翻譯與吸納：基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相遇」國際研討會紀要〉一文中，對各篇文章作報告。翁嘉琳在〈「翻譯與吸納：基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相遇」會議報導〉一文中，亦對各篇文章作報告，其中提及德國學者質疑神學能否脫離教會的處境，而在學術界中成為一種供人研究的學問。

綜觀全書，大部分文章都屬資料性及描述性。第一部分關於大公神學和漢語神學的文章，只有奈內一篇涉及普世合一的大公神學，卻沒有提及與漢語神學的關係。其他文章主要討論漢語神學的課題，也鮮有觸及大公神學和漢語神學的關係。區宗德的文章有足夠的資料搜集基礎，在歷史回顧底下，提出在方向上循否定神學與佛道思想對話，頗有參考價值。何光滬的建議，

代表某種神學路向，例如先從阿奎那入手，引進經院哲學及自然神學方法。這種重理性、哲學思辯、宗教寬容的神學，反映了一種在大學處境從事基督教研究的進路。在神學焦點方面，何光滬重人觀、生存體驗、愛與善功，並以此作為切入點是可以理解的；不過這種神學建構方法，如何能準確地表達因信稱義、以上帝為中心的本體神學，實在值得反思。第二部分關於翻譯的文章，零散地討論翻譯的理念，偶然引用歷史例證，卻沒有嚴謹地循中國基督教歷史個案作系統論述。第三部分介紹中港台漢語神學出版的文章也有資訊價值。筆者對於學術界致力漢語神學討論感到欣慰；可是到現在還未出現以基督信仰為中心、以教會為服事對象的漢語神學，這實在需要更多在神學院委身神學教育的同道發奮自勵。

郭鴻標